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文艺工作

□ 张朝朝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秧歌队的演出现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陕甘宁边区逐步形成了知识分子聚集、文艺创作繁荣、理论研究兴盛的景象。中央党校作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的重要阵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大量紧贴生活、深入群众的文艺作品，为党在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央党校恢复办学。1943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党校文艺工作得到大力推动和发展。1943年5月，拥有一批知名新闻和文教工作者、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中央研究院并入中央党校，作为党校第三部。此后，延安中央文联、西北抗日文工团合并至三部。一时间，中央党校成为延安文艺工作者的聚集地。

自此，中央党校文艺工作迅速展开，并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意气风发的景象。时任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姚铁后来回忆道：“提起延安中央党校的文化生活，凡是在那里学习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津津乐道、沉浸其中。”

成立俱乐部，担当“文化模范”。为丰富党校文娛生活，在教务处副主任刘芝明主持下，1942年4月中央党校召开了全校学工人员大会，教育长彭真发表讲话，动员全体同志积极参加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会后，中央党校拨款购买了文体活动器材，成立了党校俱乐部，把各种文体爱好者组织起来，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党校俱乐部经常举办大型文艺晚会，各部的俱乐部也多次组织晚会，各种文艺人才各显其能，以支部为单位的文娛活动蓬勃开展。

在俱乐部领导下，中央党校还组织了大众艺术研究会，成立平剧、秦腔、山西梆子、话剧、歌咏等16个组。每年春节前后，仅秧歌队的演出就有十几场，演戏、清唱、舞会组织次数更是不在话下。1943年6月，《解放日报》发表的通讯《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纪实》中提道：文化娱乐以中央党校最活跃。为搞好体育活动，党校还成立了校一级和各支部的篮排球队，与延安大学进行对抗赛。每年延安举办运动会，中央党校都是积极参加

的单位。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授予中央党校俱乐部一面“文化模范”的锦旗。

组建秧歌队，推动新秧歌运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为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兴起。1943年2月，中央党校秧歌队成立，12月完成重组，艾青任队长，丁玲任总编剧，队员由党校各部的100多名文艺人才组成。在艾青、丁玲带领下，队员们集体编写，创作出了《牛永贵挂彩》《一朵红花》《一家人》《夫妻竞赛》《拥军爱民》《走三边》等取自工农兵生活的20多部优秀秧歌剧作品，并先后在延安市、联防司令部机关、西北局、边区政府及南泥湾等地巡演，受到热烈欢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后来有些剧目还被周恩来带到重庆，由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演出，得到重庆文化界高度评价。

中央党校文艺工作者还从理论上对秧歌剧进行了研究讨论。1944年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三部学员周立波的文章《秧歌的艺术性》。1944年6月28日，三部学员、秧歌队长艾青的《秧歌剧的形式》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得到毛泽东致信称赞，并被印成小册，作为教本使用。中央党校秧歌剧以其雄厚的创作演出实力和扎实的文艺理论功底成为延安新秧歌运动的一支劲旅，极大推动了新秧歌

运动的发展。

改造经典平剧，引领平剧改革。1937年，中央党校自发成立了业余平剧组织，排演了《捉放曹》《空城计》《宋士杰》《黄金台》等传统剧目，成为延安首家排演平剧的组织。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中央党校开始对经典剧目进行重塑改造，使之符合战时环境下党的任务需要以及文艺的政治使命要求。1943年秋冬，党校教务处研究员杨绍萱、文教科科长齐燕铭共同编写平剧《逼上梁山》，该剧通过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讲古比今、教育群众，争取敌占区的军政人员弃暗投明，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一经演出便大受欢迎。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观看演出后大为赞赏，写信给杨、齐二人说：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自此，平剧改革迎来“划时期的开端”。

1944年4月，中共中央将延安平剧研究院划归党校。之后，中央党校又接连创作出《三打祝家庄》《红巾起义军》《武松》等多部优秀作品，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其中，《三打祝家庄》还成为当时许多机关、学校对干部进行策略教育的必看剧目。

开展话剧创作，带动新的话剧

运动。话剧在中央党校的文娛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1943年秋，党校三部演出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创作的话剧《俄罗斯人》。该剧公演后，引起延安观众极大兴趣，它改变了过去话剧脱离实际的倾向，实现了政治与艺术的紧密结合。以此为契机，延安新话剧运动应运而生。《俄罗斯人》演出成功后，彭真立即向党校四部俱乐部提出排演话剧的新任务，他说：我们既然能把旧剧改革好，也一定能搞好话剧。四部都是学习文化课的工农干部，希望你们能排演一个话剧。于是，由四部文教科长姚仲明创作，党校教务处副主任刘芝明主持修改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被搬上舞台。该剧以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在太和镇伏击山东纵队，造成山东纵队伤亡300多人的“太和惨案”为脚本，批判了教条主义和投降主义，歌颂了正确路线的胜利，揭示了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重要性。1944年7月，该剧在党校大礼堂正式公演，一时轰动延安，周扬还为此剧写了序言，称该剧“是一个优秀的、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政治剧本”。

1944年11月，中央党校和鲁迅艺术学院联合排演了三幕五场话剧《前线》，通过反映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前线高级干部思想状况，对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思想僵化进行了批判。该剧公演后获得中央领导高度评价肯定，不仅有力配合了延安时期党校的整风学习，而且对延安广大军民干部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之后，中央党校排演了陈白尘的著名讽刺剧《升官图》，该话剧曾先后在重庆、上海等地公演，极受群众欢迎，连得好评，奠定了中央党校在延安话剧创作创新中的重要地位。

总之，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文娛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它不仅活跃了校园生活，而且极大推动了延安文艺工作的发展进步，不论对当时的延安还是对中国后来的文艺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

庆祝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

（上接3版一条）

新形势下，外语学科的科研更加注重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和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建设的相关研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近几年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政治文献的翻译与文化认知研究，以及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的翻译问题研究，同时加强了对冷战后的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导向研究，发表了《巧妙应对传播中国声音的文化挑战》等

（上接3版二条）

基础经济理论研究,更要讲究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抽象的，属于哲学基础，即唯物辩证法；第二层次是进行理论研究或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即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第三层次是技术性的具体应用方法，如数学方法等。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就不同。马克思

学术文章，参与撰写有关国际传播的内参报告。教研室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传播的相关问题研究”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举办了学术研讨会。此外，外语学科先后与政治学和文史学科合作，参与了相关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党校重点科研课题的研究，发表了涉及中国道路、中国巡航亚丁湾和中国教育等方面的外文论文和相关编译文章，相继出版了跨学科的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民经济运行的理论，这就决定了它所采用的是以宏观为主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最早用这一方法研究社会再生产问题的是法国重农学派代表魁奈。马克思指出，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马克思将魁奈《经济表》中的年产品改造为社会总产品，又将社会总产品从最终用途上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相应社会生产区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从价值上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通过两大部类之间交换、第一部类内部交换和第二部类内部交换，三大交换

多部译著，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合情顺理》《饥饿：一部现代史》《避免战争，缔造和平》《进步派：行动主义和美国社会改革（1893—1917）》《大国之翼：“一带一路”西行漫记》等。

在中央党校建校九十周年之际，回望党校外语学科发展的历程，将更加增强党校外语教师在新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党校外语学科将继续深化外语教学改革，为党校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质量

实现社会总产品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使得国民经济按照一定规模顺利运行。以此建立起了马克思科学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建立在物质产品生产基础上的。与马克思生活时代不同，当今世界各国的服务业已经超过农业和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绝对主角，发达国家目前所占比重已经超过70%，我国在2021年也达到了53.3%。显然，仅从物质产品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因此，在《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研究》中，引入了服务商品的概念，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资

人才，并围绕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和政治文献的对外翻译传播展开研究，在翻译实践中更加注重外语译中、中译外的平衡，从而为讲好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故事作出应有的努力。

〔此文是在文史教研部外语言与文学集体编写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外语言与文学学科史》基础上提炼与改写而成〕

本再生产理论进行拓展。根据劳动价值论，服务商品作为过程性劳动产品，其价值是对象化在使用价值中的人类抽象劳动。在服务商品价值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研究》运用了现代经济学定量分析方法，将社会生产拓展为生产物质生产资料、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生产性服务商品和生产生活性服务商品等四个部类，进而构建了一个涵盖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和缩减再生产等三种类型在内的、较为完备的社会资本四部类再生产模型。该模型的建构，既打破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断同化的尴尬境地，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风格和理论特质，从而深化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是与来自异域的“他者”进行对话的过程，需要跨越彼此之间因思维习惯、文化观念、审美情趣不同所带来的交流屏障，才能取得实效。享誉中外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1894—1961年）在这方面有创新性的实践。

以画为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国际声誉日隆，国外政要和社会名流来北京，会把“访梅君、观梅剧”作为与参观故宫、天坛同等重要的日程安排。10余年间，梅兰芳接待国外人士有80余次，六七千人之多。这无疑是难得的对外传播中国戏曲的好机会。而相对于中国戏曲，外宾对中国绘画更了解一些。根据这种客观实际，梅兰芳在寓所客厅内悬挂墨笔山水、写意花卉，以画为媒，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向来访外宾讲解中国戏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种精妙而高超的对话能力，首先得益于他对绘画与戏曲关系的深刻感悟。梅兰芳曾跟随王梦白、陈师曾、齐白石等书画大家学习多年。他认为，画是静止的，戏是活动的；画有章法、布局，戏有部位、结构；画家是通过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的观察，在一张平面的白纸上展才能，演员则是在戏剧的规定情境里，在空间的舞台上立立体地显本领。艺术形式虽不同，但都有一个布局、构图的问题。中国画里那种虚与实、简与繁、疏与密的关系，和戏曲舞台的构图是有密切联系的。中国戏剧在服装、道具、化妆、表演上综合起来可以说是一幅活动的彩墨画。

他敏锐地认识到绘画在中国戏曲国际传播中的媒介作用，他认为：若想求各国民众的感情融洽，最好从美术和艺术入手。因为美术和艺术是最富有情感的，是人们思想共有的趣味，并且是不分国界的学问，所以拿它们来联络国民的感情，最容易收到效果。

以舞为桥

舞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无声语言。梅兰芳认为，为收到好的效果，选择剧目方针应该是“在观众无法听懂台词的情况下，用唱歌和舞来使观众着迷”。

事实上，梅兰芳舞台生涯的一个重要成就正是舞蹈艺术的创新性应用。他从绘画、雕塑、文学作品汲取灵感，借鉴昆曲表演艺术，将中国古典舞蹈运用在“古装新戏”中，根据剧情和人物需要，创造了一系列形式美与意境美兼备的舞蹈程式，如《嫦娥奔月》之“花镰舞”“水袖舞”、《天女散花》之“绶舞”、《上元夫人》之“拂尘舞”、《麻姑献寿》之“杯盘舞”、《霸王别姬》之“剑舞”、《西施》之“羽舞”等。而为人称道的梅氏“手势”，也竟有“含苞（持信式）”“初纂（持针线式）”“限霜（倒持扇式）”“映日（远指式）”“泛波（弹泪式）”“乘露（托盘式）”“招蝶（整袖式）”等50余种之多。

梅兰芳的艺术自觉和美学叙事得到国外观众的热烈回应。1919年访日演出期间，《朝日新闻》评论：“姿容美，声音美，再加上服装也极美，仅就这些已足能使观众赏心悦目。最紧要的是舞蹈，那又是怎样的呢？可以说大体轻妙，精致极了。”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美国现当代著名戏剧家斯达克·杨看了演出之后，难掩激动的心情，特意上门拜访，称赞“中国剧的举止动作，极雍容大雅，位置的高尚，分量的沉重，实在在世界戏剧之上”。当地媒体评论称，“人们无不惊奇地发现，数百年来中国演员在舞台上创造出一整套示意动作，使你感觉做得完全合情合理。我倾向于相信正是这种示意动作的普遍性使我们感到梅兰芳的表演含义深邃。当然正是由于这一点，而无须乎讲解，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表演”。1935年梅兰芳访问苏联演出后，美术家拉德洛夫评论，“华人手指之柔和与生动，则为吾人所望尘莫及”。

舞美梨园，梅香四海。1957年，国



际舞蹈协会授予梅兰芳一枚圆形白色大理石制成的荣誉章，上面雕刻着一位回旋起舞的女子。这枚荣誉象征着梅兰芳在艺术上的深厚造诣，也表明通过他的卓越表演和辛勤付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国际艺坛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绽放出东方民族独特的艺术光彩。

以“和”相交

梅兰芳对中国戏曲的国际传播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感，“我早就有这样一个愿望，想把中国古典戏剧介绍到国外去，听一听国外观众对它的看法”。他在《东游记》里明确说道：（1919年）第一次访日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从经济观点着眼的，这仅仅是我企图传播中国古典艺术的第一炮。

然而，梅兰芳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深刻体悟到，中国戏剧音乐的组织，很好地体现了“和”的理念，并由此引申出更宏大高远的命题——人类和平。1930年5月，他在美国波摩拿学院发表演讲，呼吁世界和平；从广义上来说，我们这次来访是想尽我们微薄的力量，以促进文明人类最恳切希望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是要从精神、理智和物质上增进人类的发展和成长；要维持世界的真正和平，人类需要相互了解、相互谅解和同情、相互扶助。

唱念做打之外，梅兰芳赋予中国戏曲形而上的价值内核，为推动中国戏曲国际传播并跻身世界艺术之林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为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作出了贡献。

□ 王更喜